

产业转移、劳动力流动与梯度陷阱

——中西部地区转移企业招工难分析

王春凯¹

【摘要】 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与劳动力就业是否相匹配，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力就业增加的关键。通过理论构建与经验分析，发现产业转移与劳动力就业匹配是由宏观因素共同塑造的。区域资源禀赋程度以及与发达地区的空间距离从宏观上塑造了劳动力的流动，而代际的流动差异和回流的家庭动因则从微观主体上影响劳动力就业选择。中西部具备产业转移的成本基础并不意味着转移是无条件的。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统一和劳动力区域回流存在选择效应，使得转移企业在中西部中小城市往往面临着招工难问题，形成区域产业转移的梯度陷阱。鉴于此，中西部地区应依据本地资源禀赋状况和区位条件承接产业转移，合理布局城市体系，完善企业生产环境和提高职工待遇，以推动区域产业与就业协调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产业转移 劳动力流动 就业匹配 梯度陷阱 招工难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12X(2021)—02—0109(07)

一、引言

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构建完备的产业链是一国经济增长和国防安全的关键。近年来，沿海地区制造业等面临着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的上升，纷纷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来降低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产业已出现了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转移的事实；^[1~3]另一方面，从调研发现，基于劳动力成本而发生产业转移的企业到转移地后，依然面临着招工难问题。即似乎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一方面是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等制造业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一方面是中西部劳动力出现了部分回流态势，导致中西部部分地区出现了转移企业招工难和本地劳动力就业错配的双重难题。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产业转移是否能够实现降低自身劳动力需求成本和促进实现中西部本地就业的双重目标？这些问题值得深入研讨。

目前，学者们对于产业转移和劳动力流动就业的关系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部分学者指出，产业转移能够促进劳动力的回流就业，从而实现转移企业降低劳动力成本和减少中西部本地劳动力外流的双重效果。^[4,5]彭国华(2015)指出，中西部本地劳动力素质与劳动密集型等转移企业相匹配，由于劳动力流动成本的存在，本地劳动力就不必流动到东部就业。^[6]安虎森、刘军辉(2014)指出，伴随着中西部技术进步，区域间产业转移促进了劳动力由东部向中西部的反向回流。^[7]另一部分学者指出，由于地区工资收入差距呈现出逐步缩小趋势，产业在区域之间的转移并不能降低劳动力成本。^[8]区域间劳动力形成了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转移刚性，产业转移并没有导致中西部本地外流劳动力的减少，^[9]亦无法实现中西部劳动力与转移产业的就业匹配。^[10]

可见，已有研究往往关注于产业转移是否带来了劳动力的回流，^[11]或者只研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否利于产业在区域之间的转移。^[12]笔者认为，产业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是否与本地劳动力资源或回流劳动力就业相匹配，即实现转移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中西部本地就业吸纳能力的增强，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本文之所以聚焦转移企业与劳动力就业匹配问题而造成的转移企业招工难现象，主要原因在于当下的产业转移与劳动力流动特征，既不同于产业梯度转移理论所假设的各区域依据比较

作者简介：王春凯，博士研究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胡焕庸线稳定性与中国人口均衡发展战略研究”（18ZDA132）

优势而实现产业转移或升级，也不同于国际间产业转移与当地劳动力密切匹配结合的假定。当前，产业转移与劳动力流动是中国转型社会所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即表现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带来的产业转移与劳动力区域间回流的选择效应同时存在。地区间产业转移与劳动力是否相匹配值得关注，否则会出现转移企业招工难问题，形成产业转移的梯度陷阱，不利于产业转移与劳动力双向协调流动。本文通过理论构建与经验分析，探究区域间产业转移与劳动力回流相匹配的机制路径，剖析中西部地区转移企业招工难的原因所在，以期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提供参考。

二、产业转移、劳动力流动与就业匹配的理论分析

产业梯度转移理论认为，不同区域资源禀赋不同，存在不同的比较优势，区域间存在梯度差异，可通过区域间产业转移实现发达地区的产业高级化和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但梯度转移理论的有效应用是建立在特定条件之下的，如劳动力在区域内部流动而不能跨区域流动，劳动力市场不受政府直接干预，发达地区主导产业处于创新阶段等。^[13]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统一，且产业转移与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密切相关，因此应在中国具体的语境下分析产业转移与劳动力相匹配问题，而不是盲目照搬产业梯度转移理论。

在产业转移和劳动力回流的双重背景下，能否实现产业转移与本地劳动力就业相匹配的双重目标呢？研究的关键在于，由于“大国经济”的特征，我国区域之间要素禀赋和区域特征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产业在区域之间呈现出梯度转移态势和梯度分布状况。在区域之间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并存的状态下，劳动力面临着本地市场与异地市场的就业选择，对于流动到东部就业的农民工而言，其面临着就业行业的转变或回流到原居住地就业的选择。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中西部地区，理论上应该有更多的中西部本地劳动力留在当地就业而不必流动到东部地区。^[14]因此在不存在区域流动障碍的情况下，劳动力区域流动会自动调节区域工资水平，从而使区域人口流动在动态中走向均衡，劳动者就业供给与产业就业需求得到均衡。但由于区域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和制度等因素，以及劳动者代际偏好的差异，使得劳动力流动往往在区域之间形成“流动刚性”。在本地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后，由于劳动力流动刚性的存在，无法吸引劳动力的回流，本地劳动力存量不足将导致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之后，转移企业面临招工难问题。若中西部本地劳动力流出后仍然存量较大，或者中西部中心城市吸引本地周边地区的劳动力流入，则转移企业不会在劳动力高存量区产生招工难问题。

因此，转移产业与转移地劳动力是否匹配的关键在于劳动力自由流动下区域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区域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区域间发展差距明显导致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形成强大的吸引力；二是自然地理环境所造成的空间距离性，以及进而由空间距离而带来的劳动力流动的心理和社会成本。从而表现为：一方面，是中西部本地就业机会的缺失与本地就业流动成本较小；另一方面，是发达地区就业机会的充足、就业工资较高与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成本的增加。因此，距离沿海发达地区较近的中西部中小城市劳动力主要流向了沿海地区，而距离沿海发达地区较远的中西部中小城市劳动力则流向了本地的大城市。



图 1 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劳动力流动与就业匹配类型

在区域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下，欠发达地区本地剩余劳动力状况以及与发达地区的空间距离决定了劳动力的就业选择与流动方向。中西部地区的大城市往往吸引了本地中小城市人口的集聚，本地劳动力相对充足，转移企业与当地劳动力能进行较好的匹配。而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特别是离沿海地区比较近的中小城市，其面临着沿海发达城市强大的“虹吸效应”，造成本地人口外流较大及回流较少，以致产业转移往往会在当地造成招工困难的情景，出现区域间产业转移梯度陷阱现象。因此，我国中西部作为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其转移产业是否能与当地劳动力相匹配，是由转移地的城市规模以及与沿海发达地区的距离共同塑造的，其决定了中西部劳动力的流向与劳动力储备情况，从而影响转移企业与当地劳动力的匹配状况。可以总结为四种类型，具体如图 1 所示。

三、产业转移、劳动力流动与就业

地区劳动力资源存量是由自然增长率和机械增长率共同决定的。当前，人口红利的消失、生育率的降低和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断上升，使得劳动力年龄下降，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意味着劳动力供给总体处于紧张状态。随着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必然引致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而部分地区劳动力资源由于面临着东部地区强大的吸引力，在本地剩余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由于劳动力回流较慢，从而局部地区在本地就业机会增加后依然呈现出短缺状态，导致产业转移之后的就业效应没有突显出来。因此，了解当前产业转移程度、劳动力流动状况，进而具体分析转移产业与劳动力就业匹配的状况，才能更加清晰地认识我国区域产业转移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

1. 2006~2017 年中国区域产业转移情况

地区间的产业转移主要表现为制造业的产业转移，本文通过 2006~2017 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测算制造业产业转移的指数来描绘近年来我国区域产业转移情况。测算方法参考孙晓华等(2018)测算过程。^[15]从表 1 可以看出，2006~2017 年，产业转出地排在前 5 名的省份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皆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入地排在前 5 名的为江西、安徽、河南、湖北、广西，主要为中部地区。由此可见，2006~2017 年间我国产业转移主要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部地区转移，总体呈现出产业由东部沿海和边疆省份向中西部内陆省份转移的态势。

表 1 2006~2017 年我国各省产业转移情况

地区	产业转移系数均值	地区	产业转移系数均值	地区	产业转移系数均值	地区	产业转移系数均值
北京	-31.19	上海	-38.72	湖北	15.00	云南	-7.91
天津	-30.85	江苏	-1.61	湖南	18.12	西藏	-1.14
河北	9.33	浙江	-20.52	广东	-13.14	陕西	4.08
山西	-15.48	安徽	30.54	广西	17.51	甘肃	-9.97
内蒙	-0.19	福建	0.52	海南	2.57	青海	9.90
辽宁	2.98	江西	42.80	重庆	10.19	宁夏	-7.51
吉林	13.34	山东	12.37	四川	12.95	新疆	5.74
黑龙江	-1.74	河南	32.94	贵州	-9.17		

2. 近年来我国区域人口流动情况

2005~2015 年,中国流动人口的区域分布呈现出由中西部人口向东部集聚转为向中西部扩散回流的变化,2005 年成为流动人口区域分布格局变化的分水岭。从表 2 可以看出,2000~2005 年,东部地区吸引人口持续流入,2005 年占比达到 64.5%。而此时中西部地区占比较为均衡,为 17%~18%。2005 年后东部地区人口占比持续减少,2015 年东部地区人口占比为 54.8%,每年以近一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而中西部流动人口占比持续上升,中部和西部地区在 10 年内分别提升了 4.5 个百分点和 5.2 个百分点。由此可见,2005 年后,中西部流动人口出现回流,中西部流动人口本省就业增加、由东部向中西部劳动力的回流以及促进中西部内部流动增加造成了中西部地区流动人口比重的上升。

表 2 2000~2015 年我国三大区域流动人口占比(%)¹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东部	56.9	64.5	59.2	54.8
中部	20.4	17.2	18.1	21.7
西部	22.7	18.3	22.7	23.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3. 中西部地区转移企业招工难与劳动力供需状况

制造业产业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主要是为了降低产业的要素成本(主要为劳动力和土地),从而实现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促进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一些研究也表明,我国中西部地区存在产业转移的低成本基础。^[16]上述分析也发现,近年来我国产业也确实出现了向中西部的转移,更加证明了中西部确实存在产业转移的现实条件。但是,另一方面,中西部部分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后仍然面临着招工难的问题,无法满足企业的生产发展需要。有研究发现,安徽当涂县作为皖江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带上的城市,转移企业在当地依然面临“招工难”的状况。^[17]也有研究发现,为解决转移企业招工难的问题,地方政府在本地车站和大街小巷进行招工宣传也无法招到工人,最终只能通过层层行政命令来满足转移企业的劳动力需求。^[18]笔者通过实地调研案例也论证了中西部部分欠发达地区存在转移企业招工难的现象。

产业转移与劳动力的回流并没有带来产业和就业的双重发展,反而由于地方招商引资,导致转移产业面临招工难问题。如,华中地区 C 县为县级市,2018 年末人口为 46 万人,靠近长三角地区。该县 2018 年进行招商引资,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从深圳地区引进 20 多家 LED 产品生产工厂,规划目标在 2019 年底引进 120 家 LED 生产厂商进入该县工业园区。但招商引资之后,发现在当地招工困难,无法满足企业的生产要求。招工普工的基本要求为:年龄在 18~50 岁(最初是 18~40 岁,因招工难上限提高至 50 岁);工作时间为 7:30~12:00 和 12:30~18:00;实行计件工资,一般月收入在 2500~4000 元左右;为员工交纳五险一金。为满足企业的招工要求,地方政府将招工具体任务分配到各个单位、乡镇和村。如,某村要求完成 88 个招工任务,需工人连续工作 3 个月才算完成任务,以致整个县城城区和乡村到处都是企业招工广告。

总体而言,产业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与劳动力的回流呈现出同向变化。但同时也出现了转移产业在转移至中西部后依然面临着招工难的问题,即产业转移与劳动力回流并不意味着产业与劳动力相匹配。原因主要在于产业转移与劳动力就业的匹配不仅与劳动力素质匹配有关,更主要在于中西部地理区位、地区工资差异以及劳动力市场结构决定了农民工回流具有选择性,往往是那些年龄较大、人力资本水平低的农民工进行了回流。转移到中西部大城市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吸引了省内当地劳动力的就业,如河南郑州的富士康生产线、四川成都的集成电路和 OLED 显示屏生产线。^[19]而转移到中西部中小城市的企业往往面临招工难的问题。因此,转移产业在中西部地区是否能够实现产业与劳动力的就业相匹配,关键在于产业转移地的地理位置、城市规模以及劳动力就业选择状况。往往中西部省会以及大城市能够实现产业需求与劳动供给的匹配。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地级市

或者县城等中小城市，由于劳动力的就业选择性而面临着转移企业招工难问题。

四、产业转移的梯度陷阱：转移企业招工难的成因

从理论分析和宏观数据上可以看出，一方面制造业等产业发生了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的区际转移；另一方面，劳动力也出现了从东部向中西部的跨区域回流。但部分地区出现了转移产业与劳动力不相匹配状况，造成转移企业依然面临招工难等问题，形成区域产业转移的梯度陷阱。笔者认为，转移企业之所以会出现招工难问题，是由下列因素共同作用的。

1. 中西部回流劳动力的选择效应

中西部劳动力回流的农民工主要为 40 岁以上的第一代农民工，回流原因为照顾家庭。研究发现，2015 年返迁人口平均年龄超过 40 岁，返迁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以中学教育为主，且返迁原因主要是为了照顾家庭和进行兼业生产，家庭因素返迁比重为 56.8%。主要在于中国农村劳动力存在反复流动的现象，外出的主要原因是增加收入，回流的主要原因是照顾老人和子女等非经济因素。^[20]因此，劳动力回流具有明显的选择效应，且回流后因年龄较大和照顾家庭等因素往往还是自主创业和零工散工，较少选择进入正规企业。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劳动力就业的主要力量。一代农民工和二代农民工的代际就业的差异性直接造成了转移企业与劳动力结构的不匹配。《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8》研究发现，2000~2015 年间新生代劳动年龄人口已经成为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主体，占全部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由 17.2% 上升至 62.3%。新生代农民工往往流向大城市的服务行业，而对于中小城市的制造业偏好性不强，转移企业更无法吸引年轻一代的劳动力回流就业。回流劳动力的选择效应造成了转移产业在中西部地区依然面临着招工难问题。

2. 城市化阶梯式推进，劳动力依城市规模递进式流动

发达地区大城市吸引周边城市的人口迁入时，这些迁出的城市人口留下的空缺将由更远地区的劳动力递补。迁移人口层层递进，将逐渐使人口向发达地区城市和欠发达地区的大城市集聚，县域内城镇人口逐渐萎缩，人口分布按城市体系呈递进式分布。劳动力的分布也会呈现出递进式分布，从而影响就业空间和就业分布。研究发现，返迁人员的就业有 43.6% 的人选择在县级以上城市工作。即使返乡人员选择再次外出的劳动力，主要更加倾向于省会城市。2015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流出地专项调查数据显示，返迁人员再次外出打工意愿选择地依次为省会城市(41.2%)、地级城市(22.3%)、县级城市(9.8%)的阶梯式下降。同时，研究也发现，近年来东部地区的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在中心城市、一般城市和外围县市分布相对均匀，而中西部地区的长江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人口流动向中心城市集中，而一般城市和外围县市流动人口比重下降。^[21]由此可见，中西部地区流入人口主要向本区域的大城市集聚，而周边的地级市和外围的县级人口流动呈流出态势。因此，当前的产业转移由于部分转移到县级或者县级市的工业园，造成了转移企业面临劳动力资源不足问题，从而出现招工难问题。

3. 地区收入差距和转移企业低工资

近年来，区域之间的工资差距虽然逐渐缩小，但东部沿海与内陆地区工资仍然具有较大的差距。同时，由于转移企业往往追求低成本而发生区域之间的转移，故转移到当地之后提供的薪酬待遇和社会福利较差，无法吸引劳动力的回流。研究发现，近年来内陆省份工作的农民工其工作满意度呈显著下趋势。^[22]特别是距离沿海地区越近的中小城市，由于流动成本较低，更加形成了区域劳动力流向的转移刚性，源源不断地向东部发达地区流动。造成转移企业无法获得低价的劳动力资源，使得转移企业和当地经济发展面临着双向困境。

由表 3 可知，东部地区农民工工资水平始终高于中西部地区，且增速也逐年高于中西部地区。说明农民工区域间的就业收

入差距并没有呈现出缩小的趋势，反而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农民工虽然出现了回流的态度，但并没有呈现出数量级的回流，只是结构性的回流。由于区域收入差距仍然是农民工区域流动的重要动因，特别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城市，由于就业机会有限，就业环境不好，人口仍然呈现出外流态势，使得转移企业并不能在当地得到发展。

表 3 不同区域农民工平均收入与增速比较² 单位：元;%

	2009		2014		2018	
	平均收入	增速	平均收入	增速	平均收入	增速
全国	1417	5.7	2841	28.8	3721	6.8
东部	1422	5.2	2966	10.2	3955	7.6
中部	1350	5.9	2761	9.0	3568	7.1
西部	1378	8.3	2797	9.6	3522	5.1

4. 产业转移地与发达地区的空间距离

产业转移地招工困难主要为中西部地区的欠发达地区和县市单位。县域经济的就业供给是由本地与发达地区距离和本地的剩余劳动力存量决定的。中西部地区劳动力仍然面临着东部地区强大的引力。如果一个地区距离发达地区较近且本地剩余劳动力有限，则产业转移往往会面临着招工不足问题。当产业转移量大于本地劳动力供给时，会使得企业面临着招工难的问题。因此，整体上的产业转移和劳动力回流与局部地区转移企业招工难问题并不相悖。关键在于对产业转移地的识别问题。往往是距离发达地区较近的地区人口外流量较大，从而不存在产业转移的劳动力基础。距离发达地区较近直接减小了劳动力的转移成本，从而源源不断地吸引劳动力流向发达地区。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显示，城市群最主要的省际人口来源地均是城市群空间距离相近的省份，如珠三角省际流动来源地主要为湖南(22.2%)和广西(20.64%);长三角主要来源地为安徽(31.10%)和河南(13.37%);长江中游城市群主要来源地为河南(19.00%)和重庆(13.32%)。可见，发达地区不断吸引着周边邻近省份的劳动力资源流入。研究发现，湘南地区位于珠三角和长株潭两大发达的经济区之间，由于长株潭城市群目前还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在长株潭地区进入成熟化的产业发展阶段之前，湘南地区承接产业仍然面临着较大的困难。^[23]产业转移到县城主要增加了县城周边近郊区域的农民工回流，而对于户籍地为镇中心附近，农民工回流可能性则越小。^[24]由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县城城郊农民占比较小，因此产业转移之后无法通过吸引劳动力的回流来满足转移企业的就业需求。

同时，伴随着高铁的迅速发展，高铁的“虹吸效应”日益明显，高铁降低了交通成本，加速了经济活动和要素由县市向区域中心城市集聚。^[25]因此，造成了距离发达地区较近的中小城市，由于人口外流到本地的中心城市或者沿海城市，企业转移到此地后往往面临着招工难问题，形成梯度陷阱。笔者调研中靠近长三角的华中地区 C 县产业转移后面临的招工难的问题验证了这一分析。

综上所述，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往往是县级市或地级市)在进行承接产业转移时，面临着本地资源禀赋的约束，当本地资源禀赋不能满足企业的生产需求，且劳动力外流趋势没有发生逆转时，转移企业将面临着招工难问题。由于县级转移企业工资待遇降低，且工作要求严格，往往不能与本地已有的剩余劳动力相匹配，且距离发达城市越近的地区，外出务工倾向性越大，转移企业在工资较低的情况下无法吸引劳动力的回流，将导致转移企业在当地依然面临着招工难，不利于企业的生产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当发达地区劳动力工资和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工资长期处于较大的差距时，劳动的单向流动态势往往形成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表现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劳动力源源不断流向发达地区。由于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工资差距仍然较大，

且距离发达地区越近，流动成本越低，因此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劳动力持续向本地中心城市和东部地区流动。回流劳动力的选择性导致转移企业在转移至中西部之后依然面临劳动力资源的约束，形成产业转移的梯度陷阱，无法实现产业转移与劳动力就业匹配的双向发展。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1. 研究结论

(1) 当前制造业呈现出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同时劳动力流动呈现出由东部聚集向中西部扩散回流的转变。产业转移与劳动力回流并没有带来产业与就业相匹配，造成部分地区转移企业存在招工难问题。

(2) 回流劳动力的选择效应和结构性转移刚性造成了中西部部分地区劳动力资源不足，无法与转移企业就业需求相匹配，造成转移企业招工难问题。

(3) 产业转移与中西部劳动力就业相匹配是有条件的，与转移地的城市规模和与沿海发达地区空间距离密切相关。中西部大城市吸引了本地劳动力的流入，劳动力资源充足，能够满足转移企业的劳动力需求。而中西部中小城市，特别是靠近发达地区的中小城市，人口大量外流到发达地区，且回流劳动力存在选择效应，造成当地劳动力储备不足，当产业转移后出现招工难问题，形成产业转移的梯度陷阱。

2. 启示与建议

(1) 启示

产业转移是否与当地劳动力相匹配，是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力个体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劳动力个体面临着区域就业与行业就业的双重选择，年轻劳动力往往跨区域就业而流向服务行业，年长劳动力一般本地就业且往往并不满足制造业等行业需求。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将在产业升级转换期呈现出结构性劳动力就业短缺现象。随着产业升级的不断完成，最终将实现劳动者素质、区域劳动力流动与就业相匹配。但在转型期，产业转移与升级仍然面临着区域劳动力与就业不相匹配的结构矛盾，如何在过渡期将产业转移与区域劳动力资源禀赋有机结合起来，推动产业逐步升级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尤为关键。

本文并不否定产业转移梯度理论的合理性，也支持通过产业转移来促进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但中西部在进行产业转移时一定要合理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与区域特征进行产业转入地和产业转出地的承接，否则会造成产业转移无效，造成资源配置无效损失。目前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往往通过地方政府低廉的土地、劳动力以及相关的优惠政策而承接产业转移，在短期内有利于为承接地创造产值、税收和就业岗位，^[26]但长期只有伴随着劳动力与产业双向同步流动才能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否则转移产业不得不面临被淘汰或再次转移。只有充分发挥地区资源禀赋特征和劳动力资源优势，才能真正实现产业转移和劳动力就业相协调，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实现区域经济大循环。

(2) 政策建议

第一，优化中西部地区营商环境，根据区域比较优势有效承接转移企业。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要合理评估当地的资源禀赋。当前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仍然存在，人口回流呈现为结构性回流而非数量级回流。因此，对于具有资源优势的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要优化营商环境，创新承接模式，创造承接产业转移的优势条件，健全劳动力市场体系，促进劳动力与企业进行优势匹配，积极与东部地区的转移企业对接。而对于资源有限、基础条件不足的中西部中小城市，要合理评估本地

劳动力资源和基础设施条件,做好对承接产业转移的类型、定位与发展方向的规划与预测,依据本区域比较优势合理布局产业结构,避免盲目招商引资造成资源浪费与财政负担。

第二,合理布局中西部城市体系,形成大中小城市产业优势互补的发展机制。中西部地区应合理布局城市体系,形成差异化的产业发展定位与分工,共同承担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实现区域产业发展的优势互补。当前中西部的大城市仍然以“回波效应”为主,尚未形成大城市带动周边城市发展的“扩散效应”。特别对于省内流动而言,人口主要流向省内的大中城市,而中小城市往往呈现出人口外流的态势。中西部在进行城市功能和城市体系建设时,要根据目前城市体系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态势进行产业的有效分工与配置。因此,中西部大城市要充分利用自身在土地、劳动力要素等方面的优势,主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产业的优化升级。中小城市应根据自身比较优势,与大城市进行协同分工,合理布局产业类型,在相互分工与协同中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第三,完善企业生产环境,提高职工待遇和生活保障水平,促进劳动力回流。当前中西部地区的务工工资较低且工厂环境较差,特别是县市单位的中小城市工资收入尤为低下,导致人口持续呈现出外流的态势。由于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就业待遇和就业机会以及就业环境在持续改善,造成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吸引力。因此,中西部地区企业要优化企业生产条件,完善职工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民工的就业待遇,改善劳动力培训体系,提高劳动力生产效率与就业意愿,促进劳动力回流就业。

参考文献:

- [1]曲玥,蔡昉,张晓波.“飞雁模式”发生了吗?——对 1998—2008 年中国制造业的分析[J].经济学(季刊),2013,(03):757-776.
- [2]唐根年,许紫岳,张杰.产业转移、空间效率改进与中国异质性大国区间“雁阵模式”[J].经济学家,2015,(07):97-104.
- [3]孙晓华,郭旭,王昀.产业转移、要素集聚与地区经济发展[J].管理世界,2018,(05):47-62.
- [4]辜胜阻,孙祥栋,刘江日.推进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的战略思考[J].人口研究,2013,(03):3-10.
- [5]刘新争.比较优势、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转移[J].经济学家,2012,(02):45-50.
- [6]彭国华.技术能力匹配、劳动力流动与中国地区差距[J].经济研究,2015,(01):99-110.
- [7]安虎森,刘军辉.劳动力的钟摆式流动对区际发展差距的影响——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研究[J].财经研究,2014,(10):84-96.
- [8]贺胜兵,刘友金,周华蓉.沿海产业为何难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基于企业网络招聘工资地区差异的解析[J].中国软科学,2012,(01):160-169.
- [9][12]樊士德,沈坤荣,朱克明.中国制造业劳动力转移刚性与产业区际转移——基于核心—边缘模型拓展的数值模拟和经验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5,(11):94-108.
- [10]陆铭,李鹏飞,钟辉勇.发展与平衡的新时代——新中国 70 年的空间政治经济学[J].管理世界,2019,(10):11-23.

[11]蔡昉,王美艳,曲玥.中国工业重新配置与劳动力流动趋势[J].中国工业经济,2009,(08):5-15.

[13]刘友金,吕政.梯度陷阱、升级阻滞与承接产业转移模式创新[J].经济学动态,2012,(11):21-27.

[14]蔡昉.中国发展的挑战与路径——大国经济的刘易斯转折[J].广东商学院学报,2010,(01):4-12.

[15]孙晓华,郭旭,王昀.产业转移、要素集聚与地区经济发展[J].管理世界,2018,(05):47-62.

[16]蔡昉,王德文,曲玥.中国产业升级的大国雁阵模型分析[J].经济研究,2009,(09):4-14.

[17][19]吴瑞君,薛琪薪.中国人口迁移变化背景下农民工回流返乡就业研究[J].学术界,2020,(05):135-144.

[18]樊士德,沈坤荣.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微观机制研究——基于传统与现代劳动力流动模型的建构[J].中国人口科学,2014,(02):17-31.

[21]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8[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8.70-73.

[22]李超,吴宇恒,覃飙.中国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变迁:2003-2013年[J].经济体制改革,2016,(01):77-84.

[23]张古,刘军辉.我国六个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比较分析[J].未来与发展,2016,(05):87-93.

[24]胡枫,史宇鹏.农民工回流的选择性与非农就业:来自湖北的证据[J].人口学刊,2013,(02):71-80.

[25]张克中,陶东杰.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分布效应——来自高铁开通的证据[J].经济学动态,2016,(06):62-73.

[26]贾卫丽,李普亮.“双转移”战略中承接地产业升级的困境与对策[J].经济体制改革,2014,(01):63-67.

注释:

1 数据来源: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及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2 数据来源:根据2009、2014、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整理而得。